

青岛大学·北京鲁迅博物馆“鲁迅研究年鉴书系”之三

二〇〇四年

鲁迅研究年鉴

郑欣淼 孙 郁 刘增人 主编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二〇〇四年

曾
正
研
究
年
鑒

刘增人 孙郁 郑欣森

主
編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迅研究年鉴. 2004/郑欣森等主编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 2005.12

ISBN 7-80623-615-5

I. 鲁… II. 郑… III. 鲁迅(1881~1936) - 人物研究 - 2004 - 年鉴 IV. K825.6 - 5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10805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 16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 28.5
承印单位 郑州新海岸电脑彩色制印有限公司	字数 352000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	版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
纸张规格 640 毫米 × 960 毫米	印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80623-615-5/K·2	定价 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目 录

特 稿

未名社旧影	孙 郁	1
——谈谈鲁迅研究中的“过度阐释”问题		
——鲁迅研究当代性与科学性关系的思考	孙玉石	20
鲁迅文化经典的当代命运		
——在“鲁迅研究二十年国际学术讨论会”上的发言	陈漱渝	28
鲁迅“正”传:一个更性感的故事		
——寇志明 著 甘棠 译	45	
网络文化传播中的“鲁迅现象”	黄 健	72

鲁迅研究年鉴

倡导研究鲁迅的文学翻译 ————— 高 玉 85

综 述

走向多元化的鲁迅研究

——2004 年鲁迅研究著作概述 ————— 呂周聚 92

2004 年鲁迅作品研究综述 ————— 崔云伟 107

2004 年鲁迅思想研究述评 ————— 毕緒龍 124

论辩“胡适还是鲁迅”的综述 ————— 刘丽华 146

2004 年关于古典学术研究者鲁迅之研究综述

————— 顾 农 童李君 166

2004 年鲁迅与外国文化比较研究述评 ————— 李春林 177

2004 年国外鲁迅研究述略 ————— 黄乔生 207

洒落在天空中的春的消息

——2004 年青年学人鲁迅研究成果述评

————— 王吉鹏 吴 丹 234

2004 年的“网络鲁迅” ————— 葛 涛 263

文献研究

1981 年以后鲁迅文献整理工作的进展与得失

————— 张 杰 282

鲁迅丧葬费史料钩沉 ————— 周楠本 293

地方鲁迅研究

鲁迅故乡鲁迅研究二十年 ————— 裴士雄 302

新时期的浙江鲁迅研究 ————— 竹潜民 315

史料钩沉·海派视阈·符码转换

——《上海鲁迅研究》二十五年 ————— 李 浩 328

新时期山东鲁迅研究一瞥 ————— 解洪祥 340

鲁迅在台湾

目 录

——探讨台湾对鲁迅研究的成果 ————— 蔡辉振 352

动 态

- “鲁迅研究二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”综述
———— 刘增人 崔云伟 379
- 《2004 年鲁迅研究年鉴》编辑撰稿座谈会简况
———— 魏韶华 385
- 纪念李何林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系列活动综述
———— 王 驱 389
- 冯雪峰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暨第三届雪峰
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 ————— 侯群雄 395

研究资料

- 2004 年鲁迅研究文章目录 ————— 马俊亭 蔡勇勤 406
- 2004 年鲁迅研究著作目录 ————— 马俊亭 蔡勇勤 446
- 编后 ————— 刘增人 449

特 稿

未名社旧影

孙 郁

—

民国年间有多少家出版社存活过，现在已不太好统计了。现代的出版多少受到了日本人的影响，从设计到出版思路，留下了许多异域的痕迹。看鲁迅、周作人、钱玄同等人的日记，常常从丸善书店邮购图书，一些重要的文献多是从那里来的。日本的书装帧讲究，译著亦丰，可说是中国了解世界的桥梁。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以降，文人出书，有时亦仿照东瀛的格式，趣味受到一定的影响。对比两国学人彼时的版本，能读出许多意思来的。

鲁迅研究年鉴

我偶看 20 年代的出版物，注意到了未名社的书籍。这个文学社与鲁迅有关，相连着一系列文学青年的名字：李霁野、韦素园、韦丛芜、台静农、曹靖华、王士菁、李何林……有一些书和杂志也是与其有关的，先后出版的有鲁迅著或译的《出了象牙之塔》、《坟》、《小约翰》、《朝花夕拾》，韦丛芜的《君山》，台静农的《地之子》、《建塔者》，以及韦素园、李霁野所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安德烈夫、果戈理的作品。《未名》半月刊及《莽原》半月刊也是那时推出的。关于这个文学社诞生的经历，李霁野曾在回忆录《忆素园》里提及过。他说：

一九二五年夏季的一天晚上，素园、静农和我在鲁迅先生那里谈天，他谈起日本的丸善书店，起始规模很小，全是几个大学生慢慢经营起来的。以后又谈起我们译稿的出版困难。慢慢我们觉得自己来尝试着出版一点期刊和书籍，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，于是就开始计划起来了。

在《鲁迅先生对文艺嫩苗的爱护与培育》里，李霁野又写道：

我在一九二四年七月，翻译了俄国安德烈夫的《往星中》，很想向鲁迅先生请教，但又怕太冒昧。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张目寒，是先生在世界语专科学校的学生，他说先生喜欢青年人，常感叹少见青年人的翻译或创作，他便把《往星中》译稿送给先生了。我从《鲁迅日记》得知，这是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。先生第二天便开始看了。一九二四年初冬的一个下午，目寒领我去访鲁迅先生。从先生的文章风格看，我原想他对人的态度是十分严肃，令人只生敬畏之心的吧。不料像先生说章太炎一样，他“绝无傲态，和蔼若朋友然”。以后韦素园、台静农和韦丛芜也都陆续和先生认识了。一九二五年夏季一天晚上，素园、静农和我访

特 稿

先生，先生因为一般书店不肯印行青年人的译作，尤其不愿印戏剧和诗歌，而《往星中》放在他手边已经有一些时候了，所以建议我们自己成立一个出版社，只印我们自己的译作，稿件由他审阅和编辑。那时北新书局已经出版了几种《未名丛刊》，我们的翻译仍然列入这个丛刊，另由未名社印行——社名也就是由鲁迅先生根据这个丛刊定的。鲁迅先生一九二五年九月三十日给许钦文的信说：“《未名丛刊》已别立门户，有两种已付印，一是《出了象牙之塔》，一是《往星中》。”未名社的工作就从此开始了。

未名社只存活了六七年，影响却是大的。这个文学出版社刊发的东西，都带有一点半灰色的、不安的情调，艺术手法鲜活，是文人气很浓的精神部落。比如韦丛芜译的《穷人》、《罪与罚》，曹靖华所译《烟袋》、《第四十一》，李霁野的译本《往星中》，俄国的主观性和惨烈的东西多。那是一个压抑的王国，青年的心借着俄国文人非理性的惊悸，苦苦地讲述着人间悲惨的故事。鲁迅和几个无名的青年很融洽地合作着。到了上海许多年后，依然眷恋着那一群人。未名社的青年人除曹靖华以外，都是安徽人。李霁野生于 1904 年，韦素园生于 1902 年，台静农也生于 1902 年，曹靖华生于 1897 年，几乎都是同龄的。这些人中，台静农的创作别具一格，有小说家的风度，不过由于受鲁迅影响过大，反而显得有些拘谨。其余几位在译作上颇下工夫，对传播俄国文学功莫大焉。以同人的方式结社创作，且推出文学精品，那是很令今人羡慕的。

据说未名社先后搬过几次，最早的办公地址是沙滩新开路十一号“破寨”，后迁至景山东街“西老虎洞”，再后又移至景山东街四十号。李霁野在家中保留了这些旧址的照片，看了不由让人生出神往之情。新文学一些重要书刊，是由几个新出山的青年完成的，就视野和境界而言，不亚于当时的名人。将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安德烈夫、托

鲁迅研究年鉴

洛夫斯基介绍于中国，都是开先河的事。不仅对后来文学影响甚巨，对像鲁迅这样的人，亦有深切的撞击。如果不是这些青年热情的刺激，也许不会接触那么驳杂的东西。韦素园、曹靖华的俄语，李霁野的英文都有优长。这些青年的劳作，带来的是些惊喜的闪光。鲁迅和那几个青年都未料到，彼此的合作都改变了精神的轨迹。

二

由作家们自己办出版物，自编自写，样子类似乎工作坊。鲁迅身边是一群孩子，艺术与思想都正在形成期，一切尚未定型，脱不了稚气。大家自觉地聚在一个老师身边，张目寒、韦素园、曹靖华都在北大听过鲁迅的课。韦素园本来是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，却不好好上课，从东总布胡同跑到沙滩的红楼去，对鲁迅的敬仰是深切的。未名社起初就在沙滩附近，六个成员经常地见面。曹靖华在《哀目寒》一文中写到那时的情形：

未名社开始有六位成员。所谓成员者，是指当时除鲁迅先生出二百余元外，其余每人各出五十元，作为“公积金”；并“立志不作资本家牛马”，用自己的钱，印自己的书。有钱就印，无钱搁起。书的内容形式，都认真负责，丝毫不苟。从写文章到跑印刷厂，事无巨细，亲自动手。这是未名社当年的大致情况。

从目前留下的《未名》半月刊及《莽原》半月刊看，20年代北京的印刷条件较差，纸张亦弱，质地远无法与今天比。刊物薄薄的，装帧也朴素得很。每一期的文章不多，质量却是高的。刊物与书的封面有文人的灵动感，是讲究趣味的。编排的体例也搭配得当，诗、小说、随笔参差于此，每期几乎都有译文，质量是高的。这些或许受到了日

特 稿

本书刊的暗示，小巧玲珑，并不贪大。在那样一个枯燥萎顿的环境，编着一种自己喜欢的杂志，用“其乐也融融”来形容他们几位，也许是恰当的。

好多资料透露了文学青年与鲁迅的交往，策划选题与编辑中的佚事。李霁野就记录过未名社友人常去先生家的情形。鲁迅的怎样谈笑，开心片刻之后能感觉出其中的讽刺与幽默。新文学初期的出版是尝试性的，风格要别于以往，不重复别人。李霁野在《忆鲁迅先生》中感慨道：

在小小的事情上，先生也往往喜欢和人异趣。记得有一回他指着《出了象牙之塔》里面天号字的小标题，问我是不是很新颖，自己说，这是他第一次试用的。书店的广告先生也不喜欢，往往自己动笔老老实实的写几句。看完我自己拟的一个广告，他说，好的，看了这样广告来买书的读者，该不会骂我们使他上当的；因为，那个广告实在是“生硬”得可以。不使读者上当，这是先生常常用以警戒未名社的话。先在期刊上发表又行集印成书的，如《君山》和《朝花夕拾》，对于再行买书的期刊的订阅者，先生嘱咐都只收一点印刷的成本，人少或竟送给。我以为从这样一点小小的事，也不难见先生著作的良心。

书面的装潢，也是鲁迅先生首先注意到的。对于书店的随意污损画家的原稿，或印刷时改变了颜色，他都很为愤慨。在一封寄给我的信中，先生有几句话这样说：“《坟》的封面画，自己想不出，今天写信托陶元庆君去了。……近来我对于他有些难于开口，因为他所作的画，有时竟印得不成样子，这回《彷徨》在上海再版，颜色都不对了，这在他看来，就如别人将我们的文章改得不通一样。”（1926年10月29日）一次为遗漏了作书面人的名字，先生特为写信到未名社嘱咐另印一页，加装进去。

未名社创办不久，就引起了读者的注意。鲁迅的书、托洛夫斯基的书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都有市场，连青年社员自己的著述也有不少人关顾，那是鼓舞过大家的。著作的出版，都是未名社同人自己的成果，而杂志的撰稿者，不时也有了新面孔。周作人、徐祖正、刘复、戴望舒、高长虹、董秋芳、向培良、常惠、冯雪峰、许钦文、于赓虞、魏金枝等都有文章刊出，队伍也算不小。这个圈子与现代评论派有所不同，审美方面甚至有些对立。鲁迅起初是高兴于此事的。看到未名社能有自己的实绩，他流露出了父爱般的热情。王治秋曾亲眼看到鲁迅在未名社出版部抚摸新书时的表情，是“见了自己婴孩似的喜悦”。高长虹在回忆文中也略微叙述了一些线索，鲁迅怎样帮助韦素园，如何与青年共事，写得饶有趣味。未名社组建得仓促，漫无目的似的。唯其这种松散、自由，才有了浑厚、自由的一面，不像一些杂志那样板着面孔。出版的几本书印得都有一般文气，即便是过了许多年，重翻那些书，不由想起几个苦苦著述的身影。现代文艺的生产过程，其实就是人与人沟通、碰撞的过程。在没有路的地方，大家携手摸索着。其间的友情、爱憎、聚散，也是一部内蕴深切的无字的书。

有了自己的园地，说自己想说的话，出自己想出的书，在那几个人看来是天然之事，本没有什么值得自足的宽慰。但不久麻烦来了，因为出版了苏俄的新书《文学与革命》，李霁野、韦素园、台静农都被关到了牢房。当他们被释放出来时，方觉得在中国做事之难，精神自由并不那么容易，在黑暗中找一个生存的缝隙原来要有生命的代价。台静农在狱里写过一首诗，映印出精神上的渴求。现实的挑战使他们唯美的梦不能继续，于是不久陷入了困顿，后来只能用挣扎来形容他们了。

特 稿

三

未名社的几个青年是处于激进与温和之间的。这一点在李霁野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。他既参与译介了托洛夫斯基《文学与革命》那样的书籍，又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《被侮辱与损害的》，以及像《简·爱》、《四季随笔》这样纯情的文学。译文是不错的，茅盾当年看了他的《简·爱》，就赞佩地说全书“谨慎细腻和流利”。世人提及李氏，第一是想起与鲁迅的友谊，第二是其大量的译著。以译文行立于文坛，在那样的时代是要付出相当的心血的。很长一段时间，他的译作一直流行着，而创作的散文、随笔却很少被注意到，才情多少限制了这位青年。

李霁野第一次出现在鲁迅面前时，形象半是潦倒的样子。先生在《忆韦素园君》里谈到了一点印象：

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罢，我在北京大学做讲师，有一天，在教师豫备室里遇见了一个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青年，这就是李霁野。

查鲁迅日记，与李霁野通信有五十封之多。鲁迅的喜欢他，是不是因了身上的文人气也未可知。李氏一生以翻译为业，若不是鲁迅的支持关照，后来也许不会走上这样一条道路。在一般人眼里，他是一个儒雅之人，内心有着诗人的温存，受到阴冷作家安德烈夫的影响，故行文有哀凉的笔体。另一方面，情调上近于书斋中的中和平淡之风，离峻急、猛烈之士就很远。1930年后他与鲁迅一时有些疏远，情调上的隔膜或许是主要的。后来的学者言及那一段历史，多讲二人的交往之密，少谈其间的障碍，本真的路不免有些模糊了。

鲁迅研究年鉴

他在未名社里是个重要的成员，有关那个团体的情况，只有他和韦丛芜留下了一点点回忆资料。那个圈子里的人都很有点主我，激进的色调不那么浓厚。台静农做一点小说，后来喜谈学问，士大夫的痕迹渐渐多了。韦素园有些忧郁，气质带有俄国文人的内倾、热烈而又痛苦的形状。李霁野则喜欢一生过一种书斋的生活，译一点什么，写一点什么，卧游于书海之间，全无做战士的准备。读过他写的一些短诗、散文、小说，觉得是个喜静不喜动的人物，思想处于冷热之间。鲁迅是赏识他的敏感、细致的，但一面又以为他过于直露，视野不广阔，也影响了作品的深度。这些感触都恰如其分。未名社其他人的文字，大约也有一点类似情况。只是台静农在创造性上，略高一筹。后来的发展，他是见到气象的。

在鲁迅眼里，李霁野这一群人像一张白纸，纯洁而清晰，是少有杂质的。只是觉得有些胆子过小，谨慎过多而少锐气，就难承受沉重的东西。像李霁野的工作不无矛盾的一面。他译了《战争与和平》，依偎在宏大的叙事里。可自己的写作，则小桥流水，温情涓涓。他的散文毫不像鲁迅，反而与周作人的调子接近。比如《谈渔猎》、《蟋蟀》、《木瓜》、《读书与生活》、《桃花源与牛角湾》，风格上暗袭苦雨斋的味道，在鲁迅与周作人之间，从心底上讲，他是更倾心于后者的。

李霁野接触鲁迅的时间很短，1926年秋后就很少见面了。但1927年之后，却与周作人有了接触，虽不密切，而跨度很长，直到40年代初还偶尔见过。20年代末，未名社因经济原因，很难维持了。韦丛芜就向周作人求救，希望得到支持。李霁野也正是在这时，与周作人有了交往。信件往来，造访谈话，次数很多。1930年他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书时，讲的是蔼理斯的《新精神》。关于蔼理斯，周作人很熟，是最早介绍此人的学者。李霁野大概也受到了影响。他还到周作人那里借过外国文学方面的讲义，可见对鲁迅弟弟的敬意。未名社成员后来与鲁迅渐渐疏淡，原因很多。据我的猜测，久住学院

特 稿

里的人，染有士风，自然易亲近周作人类型的人物。至少在抗战前，就习性与思想而言，学院里的人要真真了解自由撰稿人鲁迅，并非那么容易。

但李霁野毕竟是纯然的书生，身上是没有教授气和名士气的。这也给他带来了意外的冲击。因为印行了苏俄的文艺书籍，在1928年4月被捕入狱，同时被捕的还有台静农。出狱不久，恰好李何林逃难到未名社。李霁野知道对方是被通缉的共产党人，还是将其收留了。纯文学的梦，就这样笼上了恐怖的云雾。未名社后来未能长足发展，时局的恶化也起了相当的作用。李霁野忧于国难，苦于生存，文学之梦每每中断，只好教书为业。文学出版的工作，很快就中断了。

鲁迅最初对这个小文学社团是寄一点希望的。他在给李霁野、韦素园的信里，谈了许多翻译出版的设想，从内容到装帧，想得周到细致。当时的鲁迅正与现代评论派诸君子交恶，远离着学界，于是便将期望投入到青年人那里。未名社的人大多是老实之人，也有些才气。有许多话不便于说给别人，却能讲给这几个人，这在他是一种痛快。李霁野、台静农等人，都是没有市侩气的，也未参与到学界与文坛的圈子中。鲁迅离开北京后，最担心的是旧友们混到胡适那个圈子里，不料有许多人与那些名流为伍了。其实鲁迅也未想到，他寄予热望的未名社，也如此的短命。自韦素园病故后，这个团体基本就解体了。

四

我有一次去北京万安公墓，同路的友人指着旁边的墓葬群说，韦素园就葬在那里。于是便想起鲁迅的那篇悼文，以及照片中消瘦的形影。应当说，未名社能支撑下来，他是立了大功的。译书、策划、出

版、联络作者，他大概是付出心血最多的人。我觉得鲁迅是喜欢他的，那喜欢超过了未名社别的青年。为什么呢？第一，是人的忠厚、纯情，没有文人的那些陋习。第二，是俄文好，有锐利的文艺鉴赏目光，所译之文有清峻之风。第三呢，有殉道的激情，不张扬自我，内焚着躯体，却又忍着苦痛。在鲁迅接触的青年里，他可能是最为执著而又有忧郁气质的人，那是中国知识青年里少有的淳朴者，看他的文章与为人，大多是可以得出这一印象的。

韦素园生于1902年，读过私塾，与李霁野在安徽霍邱县是同学。他曾就读过阜阳第三师范学校、长沙法政专门学校和安徽法政专门学校。1921年到过俄国，在俄国时，正赶上了饥荒年，身体受到了损害。但俄文水平相应提高，也就是在那时喜欢上了俄罗斯文学。大概是1925年吧，鲁迅将他介绍到北京《民报》任副刊编辑，他的未名社生涯，也是在那时开始的。

据几个结识他的人的印象，说他性格有一点内倾，很少说话，然而为人却是热情的。他的身体柔弱，却有着坚毅的一面，以坦诚和刻苦赢得了周围人的信任。李霁野说他厚道，不会算计别人，自己活得真。他和朋友相处，总要付出更多的一面，那气质里流动的是挚意的气息，它也在未名社里弥散着，成了这个团体的色调。

在他的气质里也明显地含有忧郁的色彩，沉默的目光闪着迷茫和渴望。那时候他开始着手译书了，都是俄国作家的。他选择的文本都非热烈、明快的，多少都有些压抑，仿佛黑夜里的冷风，习习地吹着，让人感觉彻骨的寒冷。有时也像一曲低回的哀歌，暗暗地传动着无量的悲楚。读过他译的色尔格夫·专司基的《半神》，珂陀诺夫斯基的《森林故事》，梭罗古勃的《邂逅》，扎伊采夫的《极乐世界》，契诃夫的《献花的女郎》，都肃杀得很，阴暗里透着几许光亮。那多是命运的无奈的打量，愁色淹没了一切。韦素园选择这些，我猜想是有内心的快感的。他是不是借了俄国文人的笔，在倾诉着内心的郁闷？

特 稿

小说译得都好，文字是讲究的。这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才华。他选择梭罗古勃的文本作为依托，看重的是其中的不安与优雅。那些小说以及诗，充满了坟地的阴冷，梭罗古勃有一首诗，韦素园译道：

我们倦乏了追向目的，
工作上消了许多大力——
我们已经成熟，
为着墓地。

静静地交给墓地吧，
好像孩儿交给自己的摇椅——
在里面我们迅速毁去，
并且也没有目的。

此译诗发表于1926年10月。鲁迅是喜欢这首诗的，我以为那关于墓地的意象，也传染了先生。鲁迅的第一本论文集《坟》也编定于那一年10月，或许是巧合，或许是暗示的接受。总之，我想鲁迅的写作中，多少受到了韦素园的译文的感动。他对苏俄文学的信息，有许多也是从这个青年那里得来的。

不久韦素园就病倒了，为了未名社的出版还吐了血。他患的是肺病，在那时已是绝症。先前译的俄国悲苦的作品像是一个预兆，自己也陷入了灰色的大泽。李霁野描述他的病状时，用了凄迷的文字，当可见彼时的苦痛。有一次鲁迅到西山去看他，见到其状不无悲凉。往日的友人如此孤苦地独住于山上，勾起了无数的感怀。后来，鲁迅在悼文中沉痛地写道：

一九二九年五月末，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，